

浙江省博物馆典藏大系

ZHE JIANG SHENG BO WU GUAN DIAN CANG DA XI

瓷源掇粹

CI YUAN XIE CUI



浙江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瓷源撷粹 / 浙江省博物馆编. —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9. 7

(浙江省博物馆典藏大系)

ISBN 978-7-80715-448-8

I. 瓷… II. 浙… III. 青瓷(考古) — 简介 — 中国
IV. K87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8137 号

浙江省博物馆典藏大系
瓷源撷粹

浙江省博物馆 编

出版发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责任编辑 朱艳萍 张 姣 徐晓玲 杨少锋
艺术总监 朱艳萍
美术编辑 刘 欣
激光照排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1/16
印 张 13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15-448-8
定 价 188.00 元(平)

浙江省博物馆典藏大系

瓷源掇粹



NLIC 2970659184

浙江古籍出版社

《浙江省博物馆典藏大系》编辑委员会

顾问：毛昭晰

主任：鲍贤伦

副主任：陶月彪 陈官忠 陈浩

总主编：陈浩

副总主编：李刚 赵雁君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炬 王小红 王屹峰 李刚 杨铿

沈军甫 沈琼华 陈浩 陈官忠 范珮玲

郑幼明 赵幼强 赵雁君 陶月彪 鲍贤伦

蔡琴 蔡小辉 黎毓馨

《瓷源撷粹》

主编：沈琼华

撰文：沈琼华 蔡乃武 韩经世 陈芳 王轶凌

任卫华

摄影：郑旭明

序

浙江省博物馆创建于1929年，初名“浙江省西湖博物馆”，是中国最早成立的博物馆之一。经过近八十年的发展，如今已成为集收藏、研究、展示、教育和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人文科学博物馆。多个馆区分布于杭州城市中心，包括西子湖畔的孤山馆区、大运河边的武林馆区、老和山旁的文保科研基地、栖霞岭下的黄宾虹纪念馆和昭庆寺东的沙孟海旧居等，展示着浙江自古迄今优秀的传统文化，彰显着一种开拓进取、历久弥新的浙江精神。

自建馆以来，经过几代人锲而不舍的努力及社会各界的支持，藏品总数已近十万件。其中，以稻作文化为基础的河姆渡文化的遗物，实证文明起源的良渚文化玉器，“春秋五霸”之一的越国文化遗存，支撑“瓷器之国”的越窑青瓷、龙泉窑青瓷，装点“东南佛国”的五代两宋的佛教文物，以及南宋时期的金银货币，汉代会稽镜，宋代湖州镜，古代漆木器等，不仅具有明显的区域特色，而且还具有颇高的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此外，历代名家书画、玺印，现代革命文物等，也都是影响浙江乃至中国历史，推进文明进程的宝贵遗物。

为发挥藏品的作用，本馆除了在省内举办各种陈列、展览外，还曾在全国各地和德国、日本、新加坡、法国、瑞士、澳大利亚等国家以及我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展出具有浙江特色的文物艺术品，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和兴趣。与此同时，各种反映本馆藏品的专著和图录亦陆续出版，对繁荣文化事业、推动学术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无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陈列展览不仅内容有限，而且难以与人朝夕相伴，既往的出版物又未能全面、系统展示本馆藏品的基本面貌，所以，在信息化的新世纪，我们以图书为载体，将本馆收藏的具有代表性的藏品编辑成《浙江省博物馆典藏大系》十二种出版发行，以冀使更多的人了解浙江的历史与文化，准确地掌握本馆藏品的基本信息，促进展览交流、学术研究、艺术鉴赏，为文明社会的发展作出贡献。

历史文化遗产，是人类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和推动社会发展过程中知识和精神的累积，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作为历史文化遗产重要组成部分的文物艺术品，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蕴涵着无穷无尽的生命力，不仅是逝去时代各种信息的载体，而且对当今社会的进步也具有显而易见的现实意义。展示历史文化遗产，发掘其固有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弘扬和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文化交流、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浙江省博物馆义不容辞的责任，《浙江省博物馆典藏大系》的出版，意义正在于此。

浙江省博物馆常务副馆长

陈浩

目 录

序/003

综述/006~013

原始瓷/014~037

越窑/038~105

瓯窑/106~115

德清窑/116~125

婺州窑/126~131

龙泉窑/132~203

图版目录/204~206

后记/207

综 述

□沈琼华

浙江古代的瓷业生产几乎贯穿了中国历史从商周至明清的三千多年间,在世界范围内具有独一无二的重要地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对国内外的众多窑场均产生过深远的影响。随着朝代的更迭,社会的变迁,浙江制瓷业亦在各个窑系的兴衰过程中交替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古代各历史阶段的社会面貌。

考古资料证实,浙江至迟在商代晚期就已开始了原始瓷的生产。所谓原始瓷,即以瓷土作胎,表面挂釉并经高温烧制的产品,唯其生产技艺与产品面貌与之后的成熟瓷器相比,尚带有一定的原始性,故而名之。商至战国时期,浙江原始瓷生产区域主要集中在以德清为中心(包括湖州南部地区)的东苕溪流域,自春秋中期以后逐渐向浦阳江流域的萧山、诸暨和曹娥江流域的绍兴、上虞一带流布,在这近一千四百年间,浙江的原始瓷生产几乎从未间断。

以湖州黄梅山、德清水洞坞诸窑址的出现为代表,说明至迟在商代中晚期浙江就已经开始烧制原始瓷,由此揭开了浙江制瓷业的序幕。黄梅山窑址产品包括原始瓷与印纹陶两种,从地面采集的标本情况来看,两者比例可能基本相当。其中原始瓷以豆、罐为大宗,品种较为单一;印纹陶主要为拍印云雷纹的罐或坛类器物。这些器物与本区域内马桥文化的钱山漾上层、马桥四层及上虞商代龙窑印纹陶窑址所见器物有较多的类同⁽¹⁾。

商代末年,太伯、仲雍南奔荆蛮创建了“勾吴”,位置就在楚越两大民族分布地域的交界带。随着吴国势力的不断扩张,其政治中心也南移到苏州一带。周人的南下,带来了中原先进的农业生产和手工业技术,对江南的经济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德清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自然条件,使之成为早期原始瓷生产的重要地区。迄今为止,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河南、河北、山西、山东和长江下游地区的江西、苏南等地的商代晚期的遗址中均有原始瓷出土,而且其形制特征也基本一致。说明原始瓷一经产生,无论是在以工艺技术方式的传播上还是在产品形式的交流上,其发展速度是比较迅速的。

到了西周、春秋,尤其是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浙江的原始瓷生产步入第一个高峰。产品种类极为丰富,除了日常的碗、盘、盂等之外,出现了鼎、卣、簋、尊等原始瓷礼器,器表多饰有云雷纹、勾连云纹、双勾线“S”形纹、锥刺纹、波浪纹等,装饰华丽凝重。产品风格虽然吸收了中原青铜器的一些特点,但仍以体现本地域文化特质为主。2007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故宫博物院、德清县博物馆联合组成考古队,对德清龙山村火烧山窑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揭露西周至春秋的龙窑窑床三条,这是目前已发掘的最早的纯烧原始瓷的窑址,出土了一大批包括鼎、卣、簋在内的仿青铜器产品,为江南大型土墩墓中出土的此类器物找到了原产地⁽²⁾。

从江南地区墓葬出土情况来看,1977年,在德清皇坟堆出土了27件原始瓷⁽³⁾;1987年德清三合塔山土墩墓也出土了34件原始瓷⁽⁴⁾,两地出土的原始瓷均以礼器为多,且质量较同时期产品更精美。这似乎向我们揭示了这样的一个信息,原始瓷的生产资料性质和产品流向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些集中出土的原始瓷资料,进一步反映了原始瓷礼器是当时象征身份、地位抑或财富的贵重物品。在同时期的北方遗址与墓葬中,出土情况亦相类似。如1997年河南鹿邑太清宫的西周大型贵族墓和1978年发掘的固始县侯古堆一号墓等,都出土了原始瓷礼器⁽⁵⁾。西周开始,礼制的建立使中国社会出现了更加严格的等级制度,以等级制度确立社会的新秩序,即所谓“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下及黎庶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事有宜适,物有节文”⁽⁶⁾。这些集中出

土自贵族墓地的原始瓷礼器，是当时社会等级进一步分化的生动的物化体现。

春秋中晚期，从器物种类、装饰纹样、器形大小等方面来看，原始瓷步入一个低谷：产品种类单一，碗几乎占据了出土器物的绝大多数，极少量盘、罐类器物；产品几乎均为素面，偶见罐类器物拍印细密、规矩的简单纹饰；器形一般较小，基本不见前一时期卤类大件器物。但这一时期产品质量却明显提高，胎质细腻坚致，施釉均匀、釉色青翠、玻璃质感强。

春秋末期至战国早中期，是原始瓷发展的第二个高峰，也是浙江原始瓷生产的鼎盛期。除了德清地区规模继续扩大以外，生产区域向萧山、绍兴、上虞等地拓展，盛况空前。根据现有的考古调查与发掘资料，钱塘江以南区域窑址以烧造日常用器为主，且多与印纹陶同窑合烧。2001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的萧山进化春秋中期到战国早期的前山窑址，就是原始瓷与印纹陶同窑合烧的，产品主要是碗、碟、盅等⁽⁷⁾。而德清地区这个时期的窑址除烧造日用器外，还大量烧造原始瓷礼器、乐器、工具等。2007年浙江省考古所发掘的德清亭子桥窑址，除了生产碗、盘类产品以外，还大量烧造仿青铜器的原始瓷礼乐器：鼎、豆、尊、簋、甬钟、钲于、勾铎、悬鼓座等⁽⁸⁾，产品形制几乎囊括了2004年无锡鸿山贵族墓和江浙地区大型越国贵族墓出土的所有礼乐器⁽⁹⁾，而且其质量比鸿山大墓出土的器物更胜一筹。近几年，本馆还从这些地区征集到了零星出土的原始瓷兵器和农具，如矛、铍、镢及璧形器等，可见其器形类别相当丰富。在调查中发现，烧造此类器物的窑址在德清地区并不是个别的。

以德清为中心的东苕溪流域这一时期原始瓷生产具有以下特征：一是窑址密集、生产规模大。从目前已掌握的材料来看，这一时期的窑址已达将近60处，许多窑址分布面积大、堆积层厚，产品产量已达到了相当的规模；二是产品种类丰富。除生产日用类器物外，还大量烧造象征身份与地位、具有特殊意义的仿青铜礼器和乐器，而这些大型礼乐器的生产，目前仅见于这一窑区；三是产品质量高。本窑区的许多产品，特别是战国时期的产品体形硕大、制作规整、胎质坚致细腻、釉色青翠匀润、施釉均匀、玻璃质感强，几乎可以与东汉以来的青瓷相媲美；四是窑具形态各异，装烧工艺成熟。战国时期则大量涌现各种支烧具：有直筒形、喇叭形、托盘形和浅盘形等多种形式。因此以德清为中心的东苕溪流域的战国时期窑区，无论是生产时间、窑址规模，还是窑址产品种类、产品质量、装烧工艺等方面，在全国都是独一无二、一枝独秀的，这时期是中国制瓷史上的第一个高峰，为汉代成熟青瓷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技术基础⁽¹⁰⁾。

历史上的越国，虽然是圣王夏禹后裔之国，但“地处荒服”，其民“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在春秋之前这里的经济仍比较落后。春秋中晚期，越君允常（前510—前497）自立为王后，才开疆拓土，使越国逐渐走向强大。公元前496年，允常之子勾践即位，开始与吴国争强，“内饰兵政，外事诸侯”，发展经济，增强国力，铸造出举世闻名的“越王剑”和各种青铜农具，形成了有别于中原以青铜铸造礼乐器为主的独特的地域文化，以得天独厚的原始瓷礼乐器用于随葬。这一方面是由于越地铜矿藏资源的相对稀缺，而另一方面也反映越民族独特的价值取向。励精图治的越王勾践终于在公元前473年一举灭了吴国，称霸东南，并北渡淮河，与中原诸国争胜，登上霸主之位。纵观浙江原始瓷生产的流布与发展轨迹，恰恰与吴、越两国的兴衰相一致。

值得一提的是，楚灭越后的秦汉之际，在浙江以及周边不少地区出土的是大量习惯上被称作“釉陶”的产品，多是一些壶、甗、熏等。器物的肩部常常刻有细线飞鸟纹、水波纹、流云纹等，局部位置还有一层不甚均匀的酱褐色釉，其风格与浙江传统的原始瓷有着较大差异，而明显带有楚文化的烙印。除了在余杭地区有烧造该类器物的窑址分布以外，其他地方目前还鲜有发现，所以，对这一时期浙江制瓷业的认识与研究是今后值得我们重视的课题。

具有先进的原始瓷制作技术的浙江先民，在东汉晚期终于烧造出了真正的成熟青瓷。以上虞小仙坛窑址为代表，宁波、德清、永嘉等地均有东汉时期烧造青瓷或黑瓷的窑址分布。有了东汉制瓷业的技术积淀，优越的自然条件与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三国、西晋时期，窑址广布浙江北部和东南部等地区，尤其是上虞曹娥江中游地区

的制瓷业迅速崛起，窑场林立，产品新颖，使瓷器真正成为社会各个阶层中不可或缺的日常生活用品，也大大地促进了南方地区的经济繁荣与发展。东晋、南朝时期，战乱频仍，经济凋敝，上虞、宁波、温州、德清等地虽然仍有瓷器生产，但窑址数量骤减，产品单一，浙江的制瓷业暂时跌入了低谷。直到中、晚唐之际，浙江传统的制瓷业才再一次走向繁荣，并在五代、北宋前期进入了鼎盛期。

这一时期，瓷业的中心产区主要集中在慈溪的上林湖和上虞的窑寺前一带以及黄岩的沙埠等地。仅上林湖窑区一地，就已发现了一百多处窑址，其生产规模足可见之⁽¹¹⁾。晚唐诗人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中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诗中明确地将唐代越州范围内的瓷窑称作越窑，并称其烧造秘色瓷。这一称谓的出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越窑的重要地位。

应该说唐代浙江的制瓷业是循着我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发展壮大起来的。“安史之乱”后，北方经济陷入困顿萧条，与南方的富庶形成鲜明对比，江南成为唐王朝主要的财富来源。“天宝之后，中原释耒，辇越而衣，漕吴而食。”可见当时国家不论是粮食还是手工业制品对南方地区的倚重程度。陶瓷是上至宫廷下至黎民百姓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手工业品，在慈溪上林湖就有烧造贡瓷的贡窑。本馆收藏的出土于上林湖吴家溪的凌凋墓志罐上有“光启三年岁在丁未，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等语；唐人徐夤《贡余秘色茶盏》中亦有“陶成先得贡吾君”的诗句。唐至北宋，从“任土作贡”到“制样须索”，越窑不仅要保障中央王朝的生活之需，而且要以实物税的形式向朝廷交纳贡赋⁽¹²⁾，如此近三百年从未间断，使越窑的产品质量冠绝当世，也因此出现了“秘色瓷”之谓。对秘色瓷含义的诠释历来众说纷纭，但可以肯定的是，秘色瓷是当时越窑中的精品。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唐代真身宝塔地宫出土了13件瓷器，其衣物账上明确将其称作“瓷秘色”。有专家认为，“秘色”就是一种稀见之色，有的则认为“秘色”应是一种香草之色，还有的认为“秘”与“碧”为同声假借，“秘色”即“青碧之色”。清代蓝浦亦在《玉芝堂谈荟》中称：“秘色特指当时瓷色耳”。当今研究者多将“秘色”之“色”解作“色泽”。而陈万里先生对“秘色瓷”的解析是：“秘色瓷”是越窑的贡御瓷“类型”的专称，以秘色瓷为青色的一个统称是没有依据的，此论甚为精辟。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两件银扣秘色瓷恰恰是青黄色釉，说明青色并不是秘色瓷最为主要的特征。其实，“色”在古代除了作“色泽”解外，还有“等级”、“类别”之义。如唐太宗有“工商杂色之流，假令术逾侪类，止可厚给财物，必不可授官秩”之言⁽¹³⁾。1993年安徽省文物考古所在皖南绩溪对面窑中发掘出一件执壶，壶柄上自铭“头色瓶”。法门寺衣物账上所称“瓷秘色”而没有称作“秘色瓷”，指代的就是品类。而“秘”则是珍稀、罕见、奇特之意⁽¹⁴⁾。

五代吴越钱氏立国，为保境安民，向中原朝廷大肆进贡越窑瓷器，直至吴越纳土归宋一直供奉不息。据《册府元龟》、《宋会要》、《两宋朝贡会录》等记载，北宋立国之初，从天宝到太平兴国七年（982），就达17万件之多。不仅使越窑产品需求量激增，更重要的是产品的质量精益求精，出现了“金银饰陶”、“金棱秘色瓷”。太平兴国七年，朝廷还派赵仁济专事“越州瓷窑务”，正因为有朝廷的直接干预，才促使越窑步入鼎盛。

唐代晚期，由于陆上丝绸之路交通受阻，海上交通与贸易的发展显得更为重要。《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了“广州通海夷道”，已能通往印度洋，直达波斯湾，全长一万多公里。海上航线的开通使唐王朝与东南亚等地的贸易往来大大加强，明州港在唐宋时期也是朝廷对外开放的通商大埠。此时的越窑已声名远播，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迄今为止，在亚洲、非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发现了为数甚多的越窑青瓷。在印尼井里汶的一条沉船中打捞出水的49万件文物中，越窑瓷器就占了三分之二以上，可见当时销往国外的越窑青瓷数量是何等的惊人⁽¹⁵⁾。

盛极一时的越窑，终于在北宋的中晚期走向了衰落。究其原因，论者甚多。最传统的观点是认为龙泉窑兴起，导致越窑的衰落。依据文献和考古事实，越窑衰落的时间在北宋的中期偏后，而龙泉窑走向繁荣要在南宋的中晚期，根本构成不了对越窑的威胁。宋人叶寘《坦斋笔衡》有载：“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江南则处

州龙泉窑，质颇粗厚。”可见龙泉窑从窑址的数量和产品的质量均无法与越窑抗衡。此外，还有“斗茶”风盛行，而时人偏爱建盏等等之说。其实，如前文所言，越窑的发展兴盛一直与朝廷的介入有关。“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¹⁶⁾。北宋官窑的建立，使越窑从根本上失去了与朝廷的关联，继而北方的汝窑、耀州窑又相继兴盛，很快占领了北方市场，越窑的衰落已难以避免。诚如陈万里先生所言：“本来越器之大量生产，以及可以做到这样的精妙，完全是由于吴越王的促进，以后衰落又是完全受到政治的关系。”⁽¹⁷⁾

北宋灭亡后，宋室南迁，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随之转移到了物产丰饶的临安。此时，北宋官窑与汝窑随着当朝政权的轰然倒塌已经消亡，传统意义上的越窑已经衰落。南宋立国之初，朝廷颠沛流离，居无定所，至绍兴初年命余姚低岭头（今属慈溪）窑址烧造宫廷用瓷⁽¹⁸⁾。这些明显带有北方汝窑因素的乳浊釉瓷器，承袭了北方制瓷与装烧工艺技术，改变了传统浙江青瓷淡青色或青中泛黄的透明釉风格，采用了多次素烧、多次上釉的工艺技术，使釉层呈现出温润肥厚的玉质感。之后不久，朝廷又相继在临安自置官窑烧造御用瓷器，“袭徽宗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后郊下别立新窑，亦曰官窑”⁽¹⁹⁾。南宋官窑灰黑色的胎骨在釉下隐约显现，更增加了釉色的凝重和深沉之感，它将青瓷烧制工艺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受南宋官窑影响最大并大规模地渗入商品瓷生产的，当是位处浙南山区的龙泉窑。这种制作工艺的直接传播，使得龙泉窑迅速崛起并很快步入了它的黄金时期，形成了以大窑为中心的庞大的瓷窑体系。

成书于南宋开禧二年（1206）的《云麓漫钞》载：“今处之龙溪出者色粉青，越乃艾色。”⁽²⁰⁾考古资料亦表明，南宋中晚期，龙泉窑出现了粉青、梅子青乳浊釉瓷器，与此前的产品面貌上有本质的区别，工艺上也缺乏直接的传承关系。比对龙泉窑所烧之厚釉类产品特点，只具有薄胎厚釉垫饼烧造这一特征⁽²¹⁾，显然与南宋官窑后期产品有诸多相似之处，说明它吸收了同时期南宋官窑诸多的技术元素。较诸实物材料，不管是制瓷工艺、烧成技术，还是一些器物的造型与种类，南宋官窑与龙泉窑之间有太多的相同之处。龙泉窑厚釉产品也就是仿官类产品，可以分为白胎与黑胎两种，其温润含蓄的釉色，配以古雅敦厚的造型，将青瓷之美学意境发挥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极致地位。如此精美绝伦的瓷器当然会受到朝廷的青睐，在杭州南宋皇宫遗址和绍兴攒宫宋六陵墓地都出土了大量龙泉窑青瓷，说明南宋朝廷当时所使用的瓷器，除了来自官窑以外，尚有相当数量的御用瓷是由龙泉窑烧造的。所以说龙泉窑从其烧制的技术到产品的种类以及它的流向均与南宋朝廷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尤其是龙泉窑的黑胎类产品，黑胎、青釉、开片、紫口铁足，简直到了不可不仔细辨别的程度。明高濂在《遵生八笺》中有“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的记载，由此而产生了南宋“龙泉官窑”之说。考古发掘中，烧制黑胎青瓷的窑址都是与白胎类产品同窑合烧的，而且产量很小，无法找到其自身发生发展的生产轨迹，存世的黑胎类产品更是寥若晨星。这些产品在短时间内的突然出现，无论是简单的仿官还是贡御，都不能回避与南宋朝廷有直接的关系。明曹昭《格古要论》：“官窑器，宋修内司烧者，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爪纹，紫口铁足，色好者与汝窑相类。有黑土者，谓之乌泥窑，伪者皆龙泉所烧者，无纹路。”值得一提的是，南宋郊坛下官窑和龙泉窑都出产造型相同的黑胎花口瓶和琮式瓶，说明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可相互逆转的特殊关系：龙泉仿官的关系，和官窑从龙泉征调工匠从事官作使以龙泉窑为代表的民间技术进入官窑的可能。

纵观宋代历朝帝王，几乎都嗜好艺术，绘画书法、金石考古等艺术门类由此空前繁荣；倡言“复古”、“尚礼”之风，几乎贯穿了整个有宋一代的文化艺术领域。龙泉窑正是由于置身在艺术氛围如此浓厚的一个特殊时代里，才会生产出那么多“端庄杂流丽，刚劲含婀娜”，匠心独运的青瓷精品，它们是中国制瓷技术成就与宋代美学理念的集中体现。

如果说南宋官窑的制瓷技术使龙泉窑的产品骤然走向成熟，那么，元代繁荣的对外经济贸易则促使了龙泉窑生产规模的迅速扩大，其产品类型和产品数量急剧增加。南宋时，龙泉窑产品的外销已初具规模，泉州、明州、杭州、广州四大港口都以陶瓷与丝绸作为对外贸易的大宗商品，朝廷先后在温州、宁波等地设立市舶司进行贸

易。南宋朝廷虽然国土丧失一半，人口丧失了大半，而国家税收却反而上升。这与向“江海求利、以资国用”，大力开放海外贸易作为国策有很大的关系，海外贸易是当时朝廷敛收财源的一个重要手段。为了防止货币的外流，南宋统治者还规定对外贸易以瓷易物品的“博易”方针，这样更促使龙泉窑瓷业的蓬勃发展，使外贸瓷的需求量大增。南宋赵汝适《诸蕃志》有云：“荷兰人由福建贩运瓷器至欧洲，价值每与黄金相等，且有供不应求之热衷。”

迨至元代，朝廷的对外贸易政策较之南宋政权更为开放。1278年，忽必烈下令推动海外贸易：“可因番舶诸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宠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²²⁾蒙古族作为北方游牧民族，对贸易的依存度向来就高，他们因为现实的需要和地理位置的优越，与中亚、阿拉伯、欧洲商人建立了长期的合作。进入中原后，草原时代形成的重商习俗并未改变，因此元朝在推动海外贸易的发展上更具积极性。另外，由于经济和军事政治的需要，指望从海外贸易中获利是更为现实的目的。当时的海外贸易由官府经营与私商经营两种方式同时施行，来华贸易者无论官、私，不受限制，朝廷还要奖励“互市”，官府资本大量出现在外贸之中，贸易港口增加到了八处，由官方组织派出的商队，最盛时拥有的各种海船达15000艘。

成书于元大德八年（1304）的《大德南海志》，著录当时贸易海外之国，有142国。之后40年的《岛夷志略》，记述泉州远航所至各国，以99国为条目，各条目之中又提到其他若干国家或地区竟达百余处之多，书中有大量“青瓷”、“处州瓷”的贸易记录。包括《真腊风土记》也有元代瓷器外销的多种记述。欧洲人伊本·白图泰在他的游记中描述，当时中国船之大者，挂十帆，船内分成许多船舱，能载千人，反映了当时中国的造船业与航海技术已经相当发达。

元代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是版图最大、疆域最广的。至元八年（1271）蒙古大汗忽必烈定国号为元时，已经是占有南自黄河，北到北冰洋，西有钦察汗国、伊儿汗国、察合台汗国为封国的疆域广大的国家了。接着，蒙古铁骑南下，攻取了南宋的江南富庶之地，从而使元代疆域扩展到南海。至此，元代统治的疆域超过了汉唐盛世，其版图之大为历代之最。

在这样的内需外求的社会大背景之下，应该说龙泉窑已经占尽了天时之利，而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发达的水系网络又是它的地理之优。龙泉地处浙南山区，山上蕴藏着丰富的瓷土矿和取之不尽的森林资源。同时，龙泉又是瓯江的主要发源地，水上交通便利。巨大的市场需求量使元代龙泉窑的生产规模迅速扩大，盛况空前。据考古调查发现，元代龙泉窑遗址的数量骤然增加到了三百余处，而且其分布态势明显向瓯江两岸的云和、遂昌、丽水、青田、永嘉、文成、泰顺等地发展。以龙泉东区为例，在已发现的218处窑址中，属于宋代的有21处，宋至元时期的12处，元代的猛增到114处⁽²³⁾。从窑址分布的示意图中可以看出，龙泉东区的瓷窑遗址密集地分布在瓯江上游龙泉溪以及诸重要支流的两岸，这样的扩展，完全是为了产品运输与销售上的便利。商船沿瓯江顺流而下，运抵明州、温州等通商口岸，再销售到世界各个国家。实地考察中，元代龙泉窑窑址堆积均异常丰厚，器物品种繁多，但总体的质量却有明显的下降，因为这时候它的主要销售对象已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南宋时期的上层社会，而是普通民众，它追求更多的是产品量的增加，而不是产品品质的提高。1975年在韩国西南部的新安海底发现一艘元代沉船，打捞出万多件瓷器，其中龙泉窑青瓷占了九千多件⁽²⁴⁾，这些瓷器与宁波宋元市舶库北边海运码头出土的大批宋元时期的龙泉窑系青瓷的品种与面貌完全相同，船上还发现了一件有“庆元路”铭文的铜砵码，说明这艘船当时就是从明州港起程的。新安海底沉船的发现，足以反映龙泉青瓷在元代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和惊人的数量⁽²⁵⁾。龙泉窑青瓷的足迹遍布了亚、非、欧等五十多个国家与地区，以至于在当今世界各大博物馆中基本上都能看到龙泉窑青瓷的情影，它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可谓大矣。

由于龙泉青瓷的大量外销，给龙泉的瓷业生产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反之，龙泉窑的产品面貌也因之添加上了诸多的外来因素，形成了多元文化交相融合的独特时代风格。

元代中国的制瓷业呈现出了新的秩序与格局，所谓的宋代几大名窑已相继衰落，名窑林立的局面已然成为过去。景德镇青花瓷则刚刚创烧不久，生产规模难以与龙泉窑抗衡，集宁路元代窖藏和元大都遗址里出土的都是龙泉窑青瓷，说明此时独步天下的仍是龙泉窑生产的青瓷器。《元史》记载：“中统以来，杂金宋祭器而用之。至治初，始造新器于江浙行省，其旧器悉置几阁。”⁽²⁶⁾这里虽然没有明确提到由龙泉窑烧制“新器”，但究其事实，当时除龙泉窑之外，江浙行省已不存在其他可与龙泉窑比肩的窑业在生产瓷器的事实依据。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明代龙泉窑的认识一直处于含浑不清的状态，明代龙泉窑已经走向衰落的观点一度成为学界定论。虽然《大明会典》有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定：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要定夺制样，计算人工物料。如果数多，起取人匠赴京，置窑兴工，或数少，行移饶、处等府烧造。”《明宪宗实录》中也有“江西饶州府，浙江处州府，见差内官在役烧造瓷器……”的记载，但由于缺乏考古事实依据，不能妄加评述，甚至将明初龙泉窑专为宫廷烧造的一大批御用瓷，均视为元末所烧。大窑枫洞岩窑址的发掘，揭示了明代中期以前，特别是明初龙泉窑真实的历史状貌。在1600平方米的发掘范围内，据粗略估计，出土了至少50吨的残瓷片，却与清宫旧藏及南京故宫遗址出土的龙泉窑青瓷完全一致。其器形硕大，形制规整，纹样精致，釉色匀润，制作上的讲究与精细程度是龙泉窑其他产品所无法追摹的。在造型与纹饰题材上与同时期景德镇生产的御用青花瓷相同，不同之处只是一个采用刻划，另一个系青花彩绘。这不仅印证了文献记载中两窑为宫廷烧造过御用瓷器的客观事实，而且说明两窑当时采用的是同样的官样，是宫廷“须定夺制样”的事实依据。遗物中还出土了带有“官”款的器物 and “永乐九年”、“永乐辛卯”的年号款印模，为判定窑址的绝对年代提供了极其精确的依据⁽²⁷⁾。

这些身份非凡的龙泉窑青瓷在进入宫廷充实御用的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的用途，那就是作为朝廷的赏赉瓷而流行于世界多个国家。永乐皇帝最喜欢的是当时景德镇所产的“甜白釉”瓷，《明太祖实录》记载：永乐四年（1406）回回结牙思进贡玉碗，“朕朝夕所用中国瓷器，洁素莹然，甚适于心，不必此也”。而海外对龙泉窑青瓷的喜欢就不同了，明代马欢《瀛涯胜览》占城条记有：“中国青瓷盘碗等品……甚爱之”，许多国家将龙泉青瓷视为财富与地位的象征。迄今为止，海外收藏的明初龙泉窑青瓷明显多于国内所藏，恰好也说明了这一点，这与明代的外交贸易有很大的关系。

明皇朝的外交外贸政策，改变了龙泉窑瓷器自元代以来作为外贸商品的单一属性。明初实行海禁，只允许进行由政府统制的以“朝贡贸易”为形式的对外商业交往，禁止民间私自往来交易。所谓“朝贡贸易”，就是明朝政府特许前来进贡通好的外国“贡舶”附带一定数量的商货，在指定的地点与中国做买卖的一种对外贸易形式。这种贸易方式其政治色彩要远远重于经济利益，它只是明皇朝立国之初为招徕海外各国遣使来华通好，以壮大国声威的政治手段。永乐初，西洋刺泥国回回哈只马哈没奇等来朝，附载胡椒与华商互市，有司请征其税，为皇帝所拒绝：“商税者，国家抑逐末之民，岂以为利？今夷人慕义远来，乃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多矣。”⁽²⁸⁾而且，明初朝廷对外国贡使带来的贡品一律本着“薄来厚往”的原则回赠，对贡使团附带来华贸易的商货，虽例有抽分，但一般都特予免税，还往往由政府出高价收买大部分。如洪武二年（1369）规定：“朝贡附至番货欲与中国贸易者，官抽六分，给价偿之，仍免其税。”⁽²⁹⁾所以“朝贡贸易”基本上是不得不偿失的赔本买卖，于国家经济发展无大好处。久而久之，朝廷反而不堪重负，不得不对贡期、贡船数目、随船人数、进境路线及停泊口岸等都做出限制性规定。此时，东南沿海倭患日益严重，这进一步促使明朝政府的对外政策趋向保守，最终导致了嘉靖年间的全面海禁。

元代以来，正是由于海外市场的巨大需求，支撑着龙泉青瓷的迅速发展，所以随着明代中期朝廷实行海禁，海外贸易被迫中断以后，龙泉窑的瓷业生产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重创。而此时的景德镇窑烧制出了五彩缤纷、胎体轻巧的成化斗彩、嘉靖五彩等等新的彩瓷品种，在国内大行其道，深得朝廷和世人的喜爱。失去了海内外市场依托的龙泉窑制瓷业没有了内在的驱动力，使得质量下降，产量陡减。据清乾隆《龙泉县志》记载：“明正统时顺

仕成所制者，已不及生二章远甚，化治以后质粗色恶，难充雅玩矣。”大窑枫洞岩窑址的考古发掘中出土的带“顾氏”铭器物，其器形与质量确实难与前期相提并论。嘉靖《浙江通志》亦有记载：“自后器出于刘田者已简陋利微，而课税不减，民甚病焉。”如此，龙泉窑走向衰落已无法避免，至明末清初，境内只有寥寥几家窑址还在生产，但质差量少，再难重复往昔的荣耀与辉煌。

诚然，任何事物的产生和发展，终究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孤立存在，必然会受到社会及其他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参考资料

- (1) 潘林荣《湖州黄梅山原始瓷窑址调查简报》，《东方博物》第四辑，1999年。浙江省考古研究所《浙江上虞县商代印纹陶窑址发掘报告》，《考古》，1987年第11期。
- (2)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德清县博物馆《德清火烧山原始瓷窑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
- (3) 姚仲源《浙江德清出土的原始青瓷器——兼谈原始青瓷生产和使用的若干问题》，《文物》，1982年第4期。
- (4) 朱建明《浙江德清三合塔山土墩墓》，《东南文化》，2003年第3期。
- (5)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口市文化局《鹿邑太清宫长子墓》，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始县侯古堆春秋墓》，大象出版社1964年版。
- (6) 《史记·礼书》。
- (7)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浙江萧山前山窑址发掘简报》，《文物》2005年第5期。
- (8) 陈元甫、郑建明等《浙江德清发现战国时期越国“官窑”》，《中国文物报》，2008年4月16日。
- (9) 南京博物院、江苏省考古研究所、无锡市锡山区文物管理委员会《鸿山越墓出土礼器》，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
- (10) 郑建明、陈元甫、周建忠《“瓷之源——原始瓷与德清窑学术研讨会”纪要》，《文物》2008年第9期。
- (11) 林士民《浙江宁波古代瓷窑遗址概述》，《中国古陶瓷研究》第二辑，1988年。
- (12) 王光尧《中国古代官窑制度》，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
- (13) 《旧唐书》卷一七七《曹确传》。
- (14) 权奎山《唐代越窑秘色瓷的秘色涵义初探》，沈琼华主编《2007'中国·越窑高峰论坛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
- (15) Adi Agung《井里汶海底十世纪沉船打捞记实》，《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6期。
- (16) (宋)叶寘《坦斋笔衡》。
- (17) 陈万里《越器图录》，中华书局1937年版。
- (18) 《中兴礼书》卷五九《明堂祭器》。
- (19) (宋)顾文荐《负暄杂录》，《说郛》卷一八。
- (20) (宋)赵彦卫《云麓漫钞》，中华书局1996年版。
- (21) 浙江省轻工业厅《龙泉青瓷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 (22) 《元史》卷十，《世祖纪》。
- (23) 浙江省文物考古所《龙泉东区窑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
- (24) 《新安海底遗物·综合篇》，1988年版。
- (25) 林士民《宁波东门口码头遗址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1981年。
- (26) 《元史》卷七四，《祭祀三》。
- (27) 沈岳明《大窑枫洞岩明代龙泉窑址考古新发现》，《紫金城》2007年第5期。
- (28) 《明史》卷八一，《食货五》。
- (29) 《续文献通考》，卷二六，《市籴考二》。



原始瓷

原始瓷，顾名思义，是指瓷器的一种原始状态。若从理化层面去解读，发明原始瓷，需要懂得选择特殊的胎釉原料和制备方法，更要掌握1200℃左右的烧成技术，因此比一般意义上的制陶要艰难得多。商周时期，浙北平原的低山丘陵具有理想的制陶条件，浙江先民率先在湖州、德清等地生产出精美的原始青瓷，并进一步在萧山、绍兴一带有了更大规模的商品化生产。这些原始瓷产品造型规整、釉层匀净，且经济实用，可与同时期北方所产青铜器相媲美，既有大量能进入寻常百姓家的碗、盘、杯、盏等日常生活用品，更有直接模仿商周青铜礼器的礼仪重器。